新时代青少年早期文化价值观的发展轨迹：同伴接纳的作用*

陈万芬[1] 刘俊升**[1] 李 丹[2] 陈欣银[3]
（[1]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上海，200062）（[2]上海师范大学心理学系，上海，200234）
（[3]宾夕法尼亚大学教育学院，费城，19104–6216）

摘 要 采用问卷法和同伴提名法对1244名四年级学生进行为期三年的三次追踪，使用线性潜增长模型建模，检验四到六年级学生个体和集体取向价值观的变化趋势，并考察同伴接纳对两类文化价值观发展的影响及性别差异。结果显示：（1）青少年早期个体取向价值观呈线性上升趋势，起始水平存在显著个体差异，而变化速度不存在显著个体差异，起始水平和变化速度之间不存在显著关联；集体取向价值观呈线性上升趋势，起始水平及变化速度都存在显著个体差异，起始水平和变化速度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2）个体取向价值观的起始水平和变化速度都不存在显著性别差异；女生的集体取向价值观起始水平显著高于男生，而变化速度不存在显著性别差异；（3）较高的同伴接纳对特定时间点上个体和集体取向价值观的上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关键词 个体取向价值观 集体取向价值观 发展轨迹 线性潜增长模型 性别差异 同伴接纳

1 引言

价值观是个体态度和观念的深层结构，它主宰着个体对外界世界感知和反应的倾向（杨宜音，1998）。青少年时期是价值观形成和发展的关键时期，是否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将直接影响个体的健康成长。党和国家高度重视青少年价值观的养成，习近平总书记（2014）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明确指出，“青年的价值观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一方面经济增长速度惊人，城市化进程加快（Zeng & Greenfield, 2015），另一方面经济文化交流加深，各种价值观念相互交融、竞争，这很有可能会对中国青少年的价值观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Chen, Wang, & Liu, 2012）。本研究拟以文化价值观为切入点，考察当前新时代背景下，青少年早期集体取向（group-orientation）和个体取向（self-orientation）价值观的发展轨迹及可能的影响因素，以期为青少年价值观的养成和健康发展提供实证支持。

1.1 文化价值观的发展

集体取向和个体取向价值观是个体看待世界与自身关系并与之互动的两种不同方式（Oyserman, 2017）。集体取向价值观以关注群体福祉和人际义务为主要特征，注重社会归属感和社会融入。而个体取向价值观则以个性和独立为主要特征，注重个体观点和行为风格的表达（Chen et al., 2012）。已有研究表明，集体取向和个体取向价值观对个体的适应和发展均有重要作用，可以帮助个体在追寻个人目标实现的同时维持与他人的良好关系（Chen, 2015; Kagitcibasi, 2012）。

传统上，中国是以集体取向价值观为主导的社会。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秉承儒家思想的内核，强调集体归属和关系和谐，提倡内敛、谦让的行为方式。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个人利益应服从于集体利益（King & Bond, 1985; Luo, 1996）。在此背景下，集体取向价值观被认为是青少年早期社

* 本研究得到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人文社科重大项目“社会变迁进程中青少年价值观发展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18YJA190009）和上海学校德育理论研究课题（2017–B–010）的资助。

** 通讯作者：刘俊升。E–mail:jsliu@psy.ecnu.edu.cn

DOI:10.16719/j.cnki.1671–6981.20180603

会化的重要目标，具有重要的适应意义（Chen et al., 2012; Zeng & Greenfield, 2015）。

然而，中国社会在过去四十年间发生了巨大的社会转型。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经济水平迅速增长，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在此背景下，个体目标的实现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苏红，任孝鹏，2014; Chen, Cen, Li, & He, 2005）。学校教育政策和实践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变，开始鼓励儿童发展传统文化中所忽视的独立、自我表达等社会技能（於荣，2002）。而父母也在与儿童的互动过程中，更加鼓励自我探索（Way et al., 2013）。个体取向价值观同样成为青少年早期社会化的重要目标，并得到了城市青少年的认同（Chen et al., 2012）。

Greenfield（2009）提出的社会变迁和人类发展理论试图解释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如何改变人们的文化价值观和学习环境，从而影响儿童发展。通过研究过去两个世纪以来全球社会环境的变化，Greenfield 总结出两种典型的社会环境：一种称为礼俗社会（Gemeinschaft）。这种社会背景中的人们更多生活在农村，在家里接受非正规的教育，掌握一些简单的技术，能自给自足。另一种称为法理社会（Gesellschaft）。这种社会生态环境中的人们主要生活在城市，接受正规教育，有着商业化经济，使用高科技产品。Greenfield 认为任何向法理社会变化的过程中，人们都倾向于有更多的个体取向价值观、更加独立的社会行为和更抽象的认知发展。与此相反，任何朝向礼俗社会的变化，人们的价值观、行为和认知则出现相反的变化模式，更注重集体取向价值观，相互依存的人际交往和更具情境化的思维方式（Greenfield, 2013）。

然而，已有研究指出，虽然城市化进程会导致个体取向价值观水平的提升，但这并不意味着集体取向价值观水平的下降。很多传统上倾向集体主义的地区在推进城市化和发展经济之后，在个体取向价值观增加的同时，集体取向价值观仍为人们所接受（Kagitcibasi, 2012; Zeng & Greenfield, 2015）。Chen（2015）在回应 Greenfield 理论的一篇论文中提出了“多元建构”的观点。他认为在全球社会变革中，价值观可能向多元价值体系共存和整合的方向发展。虽然个体取向价值观可能对个体的态度和行为产生重要影响，但它不可能完全取代集体取向价值观，而是与之共存和整合。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些传统价值观，特别是那些具有蓬勃文化根源的价值观，可能会维持并体现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作为儒家思想和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核心特征，集体取向可能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表现出强大的稳健性，继续对中国青少年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Oyserman, Coon, & Kemmelmeier, 2002)。从这一意义上讲，青少年很有可能既继承了传统的集体取向价值观，又吸收了西方的个体取向价值观。考虑到个人目标的达成和社会关系的建立在青少年早期阶段日益重要（Rubin，Bukowski, & Parker, 2006），我们预期中国青少年的个体取向和集体取向价值观水平均有可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上升。

1.2 文化价值观发展的性别差异

有关青少年早期文化价值观性别差异的研究较少。仅有的一项针对四到六年级小学生的横断研究发现，女生的集体取向价值观水平显著高于男生，而个体取向价值观水平无显著差异 (Liu, et al., 2018)。在中国和西方社会，由于性别刻板印象，人们鼓励男孩比女孩更加自主和独立，而女孩通常被期望比男孩对社会关系更感兴趣 (Maccoby, 1998)。社会中与性别相关的期望以及相应的社会实践可能会反映在青少年早期的文化价值观发展过程中，即女生比男生可能有更高的集体取向价值观起始水平。

此外，尚没有研究探讨青少年早期集体和个体取向价值观发展速度上的性别差异。虽然女生比男生花费更多的时间用于同伴交往，同伴关系更为紧密 (Ma & Huebner, 2008)，但对同伴关系的重视和期望程度也明显高于男生 (Bakker, Ormel, Verhulst, & Oldhinkel, 2010)。集体取向价值观发展速度的差异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的是个体融入集体环境、建立集体归属感的过程。男生和女生融入相应集体的方式虽有不同，达到的客观水平亦有差异，没有证据表明二者在集体取向价值观的发展速度上存在差异。因此，我们假设男生和女生在集体和个体取向价值观的发展速度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1.3 同伴接纳与文化价值观发展

如前所述，中国社会过去四十年间的巨大社会转型，尤其是新时代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带来了多元文化价值观念的共存与整合（Chen, 2015），构成了青少年发展的独特情境。这种宏观环境的改变可能通过多种途径影响青少年的发展。其中，同伴互动和同伴关系很有可能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Chen & French, 2008; Chen, 2012）。

已有大量研究表明，同伴互动和同伴关系对青

少年的认知、情绪和道德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Rubin, et al., 2006)。在与同伴的互动过程中，青少年逐渐习得各种技能，并形成对事物的价值判断。而同伴互动和同伴关系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宏观文化环境的影响。根据 Hinde (1987) 的观点，不同水平的社会经验均嵌套在文化系统中。文化价值观念和取向构成了同伴互动过程中行为解释和评价的基础，而这种解释和评价又可以进一步塑造个体的行为和观念 (Chen, 2012)。当前多元文化价值观共存与整合的独特发展情境，一方面强调个体的独特性，注重自信与独立，另一方面也强调集体的重要性，注重合作与奉献。在同伴互动过程中，相应的价值观念也更容易得到同伴的强化。而同伴接纳是反映同伴关系的重要指标 (Rubin et al., 2006)。从这一意义上讲，良好的同伴接纳关系很有可能会强化青少年的集体取向和个体取向价值观念的发展。然而，目前还没有研究探讨同伴接纳对青少年早期文化价值观发展的影响。在本研究中，我们拟将同伴接纳作为随时间变异的协变量，考察其在青少年早期文化价值观发展中的作用。我们假设：较高的同伴接纳会对当时青少年早期个体和集体取向价值观的上升产生促进作用。

综上，本研究试图通过历时三年的追踪调查，采用线性潜增长模型，考察中国青少年早期个体和集体取向价值观的发展趋势，并考察性别和同伴接纳对青少年早期文化价值观发展的影响。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本研究是一项历时三年的纵向追踪调查，初始被试是来自上海市九所小学的四年级学生。三次调查分别在其四年级、五年级和六年级的学期中段进行。调查开始前，请教师发放介绍本研究的《家长知情同意书》，家长签名同意后由教师收回，再统一交给研究人员。第一年参加调查的有效被试为 1244 人，其中男生 613 人（49.28%），女生 631 人（50.72%），被试平均年龄是 10.36 岁（*SD*=6.53 个月）。由于缺席和转学等原因，第二次和第三次分别流失被试 135 人和 72 人。同时，也总共增加了 145 名被试。

卡方和 *t* 检验的结果显示，流失的被试和继续参加研究的被试，在性别（χ^2（1）= 7.28，p < .01）和第一次测量的同伴接纳（t（1097）= -3.02，p < .01）上存在显著差异；在年龄（t（1080）= .81，p > .05）、第一次测量的个体取向价值观（t（1097）= -1.37，p > .05）和集体取向价值观（t（1097）= -1.38，p > .05）上没有显著差异。

2.2 研究工具

2.2.1 价值观量表

使用文化价值观量表测量被试的个体和集体取向价值观 (Chen et al., 2012)。该量表共 17 个题目，5 点计分，从 1 “完全不符合”到 5 “非常符合”。包含 2 个子量表：个体取向价值观（如“我喜欢有自己独特的地方，和别人不一样”等）和集体取向价值观（如“维持群体里的和谐，对我来说很重要”等）。计算被试在每个子量表上得分的平均分，得分越高，说明其个体和集体取向价值观越高。已有研究表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Chen et al., 2012)。在本研究的三次测量中，个体取向价值观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67、.71 和 .74；集体取向价值观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76、.83 和 .84。

2.2.2 同伴提名

本研究采用同伴提名的方式，让被试从所在班级中分别选出最多三名最喜欢和最不喜欢一起玩的同学。把每个被试得到的积极提名和消极提名次数以班级为单位进行标准化。本研究参照已有研究的处理方法 (刘俊升 , 周颖 , 李丹 , 2013)，用积极提名得分减去消极提名得分来计算被试的同伴接纳得分。同伴提名法已被广泛用于测量儿童青少年的同伴接纳程度 (刘俊升等 , 2013)，是一种有效可靠的测量方法。

2.3 研究程序

本研究中的问卷调查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团体施测。研究主试是经过专门训练的发展心理学专业研究生。施测前，主试向学生说明调查仅供科学研究使用，作答无对错之分，且会为他们的作答保密。参加测试的被试在每次测查后会得到一份小礼物。

3 结果

3.1 描述统计

本研究中缺失值采用多重插补（Multiple Imputation）进行处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1 所示。相关分析结果表明，个体取向价值观、集体取向价值观和同伴接纳在三个测试时间点均呈显著正相关；而且这三个变量都表现出中等程度的稳定性。此外，根据数据的分布情况，在进行无条件线性潜增长模型建模时，采用极大似然估计

表 1 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偏度、峰度及相关系数矩阵

变量	T1SOV	T1GOV	T1PA	T2SOV	T2GOV	T2PA	T3SOV	T3GOV	T3PA
T1SOV	1								
T1GOV	.53**	1							
T1PA	.12**	.18**	1						
T2SOV	.48**	.28**	.07*	1					
T2GOV	.31**	.44**	.11**	.54**	1				
T2PA	.14**	.17**	.68**	.14**	.18**	1			
T3SOV	.43**	.26**	.16**	.45**	.33**	.14**	1		
T3GOV	.23**	.34**	.12**	.24**	.48**	.11**	.62**	1	
T3PA	.08**	.12**	.69**	.12**	.14**	.72**	.15**	.14**	1
性别	.01	.08**	.12**	.04	.10**	.11**	.02	.04	.13**
M	3.71	3.94	.01	3.81	4.03	.01	3.87	4.05	.01
SD	.74	.69	1.52	.73	.71	1.58	.73	.71	1.61
偏度	-.36	-.62	-.72	-.44	-.80	-.76	-.50	-.78	-.73
峰度	-.16	.26	2.56	.07	.71	2.18	.03	.66	2.14

注：T1、T2、T3 分别为四年级、五年级和六年级；* $p < .05$，** $p < .01$，下同。SOV= 个体取向价值观；GOV= 集体取向价值观；PA= 同伴接纳。

（Maximum Likelihood，ML）估计模型参数；在加入同伴接纳协变量时，采用稳健极大似然估计（Robust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or，MLR）估计模型参数 (Curran, West, & Finch, 1996)。

3.2 文化价值观的变化趋势：无条件模型

为了检验个体和集体取向价值观的变化趋势，分别构建线性无条件潜增长模型（见图 1）。线性潜增长模型只需估计截距和斜率，截距代表个体和集体取向价值观的起始水平，所有的因子载荷固定为 1。斜率代表个体和集体取向价值观的变化速度，根据测试的间隔时间将因子载荷分别设为 0、1 和 2。

从表 2 中的拟合指标可知，线性无条件潜增长模型对个体和集体取向价值观的数据拟合良好。个体和集体取向价值观模型的截距分别为 3.72 和 3.95（$p < .001$）；个体和集体取向价值观在三次测试期间呈上升趋势，斜率分别为 .08 和 .06（$p < .001$）。此外，个体和集体取向价值观截距的变异都显著（$p < .001$）。个体取向价值观斜率的变异不显著（$p > .05$），而集体取向价值观斜率的变异显著（$p < .001$）。最后，个体取向价值观的截距和斜率之间相关不显著（$r = -.03$，$p > .05$），而集体取向价值观的截距和斜率之间呈显著负相关（$r = -.04$，$p < .01$）。

3.3 文化价值观变化趋势的性别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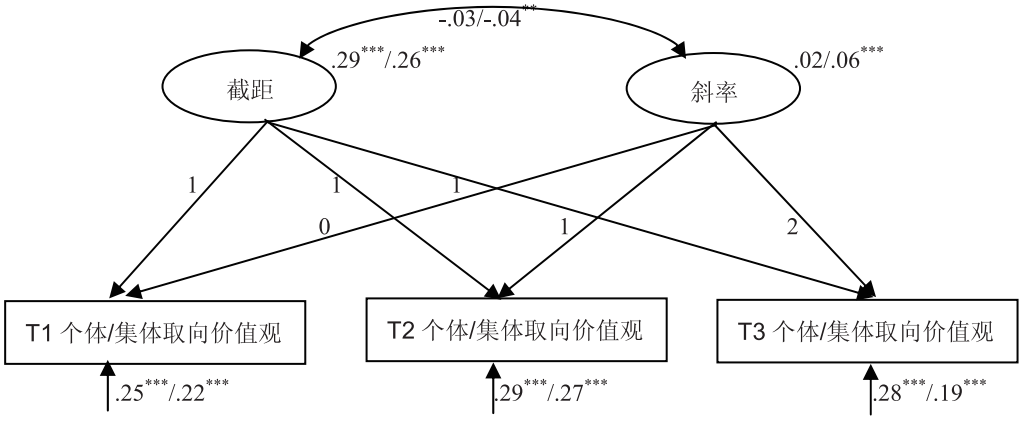


图 1 个体 / 集体取向价值观的线性无条件潜增长模型

注：*** $p < .001$，下同。

表 2 线性无条件潜增长模型的拟合指标和系数

模型						均值		变异	
	χ^2（*df*）	*p*	CFI	RMSEA	SRMR	截距	斜率	截距	斜率
个体取向价值观	1.41（1）	.24	.99	.02	.01	3.72***	.08***	.29***	.02
集体取向价值观	5.02（1）	.03	.99	.06	.02	3.95***	.06***	.26***	.06***

为了考察个体和集体取向价值观的变化趋势是否存在性别差异，在线性无条件潜增长模型中加入性别协变量，构建条件模型（见图 2）。模型检验结果显示，该条件模型对个体取向价值观数据的拟合良好，χ^2（2）= 2.60，p = .28，RMSEA = .02，CFI = .99，SRMR = .01；对集体取向价值观数据的拟合也良好，χ^2（2）= 7.39，p = .02，RMSEA = .05，CFI = .99，SRMR = .01。个体取向价值观的截距（γ = .03，p > .05）和斜率（γ = .00，p > .05）都不存在显著性别差异。集体取向价值观的截距（γ = .12，p < .01）存在显著性别差异，女生起始的水平显著高于男生；集体取向价值观的斜率（γ = -.03，p > .05）不存在显著性别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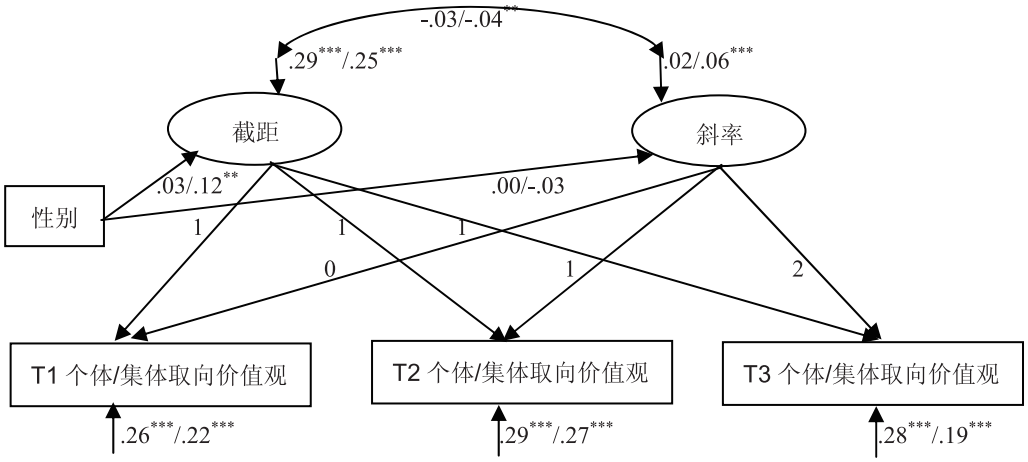


图 2 性别对个体 / 集体取向价值观变化轨迹的影响

3.4 文化价值观的变化趋势：同伴接纳的影响

为了考察同伴接纳对个体和集体取向价值观变化趋势的影响，以同伴接纳作为时间变异协变量，性别作为时间恒定协变量构建条件模型（见图 3）。结果表明，该条件模型对个体取向价值观数据的拟合可以接受，χ^2（8）= 29.90，p = .00，RMSEA = .05，CFI = .97，SRMR = .02；对集体取向价值观数据的拟合也可以接受，χ^2（8）= 22.85，p = .00，RMSEA = .04，CFI = .98，SRMR = .01。在特定时间点上，个体的同伴接纳水平越高，其个体取向价值观水平越高（四年级：β = .05，t = 3.71，p < .001；五年级：β = .05，t = 3.57，p < .001；六年级：β = .06，t = 5.05，p < .001）；其集体取向价值观水平也越高（四年级：β = .08，t= 6.07，p < .001；五年级：β = .07，t = 5.87，p < .001；六年级：β = .06，t = 4.82，p < .001）。即同伴接纳对于个体和集体取向价值观的上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4 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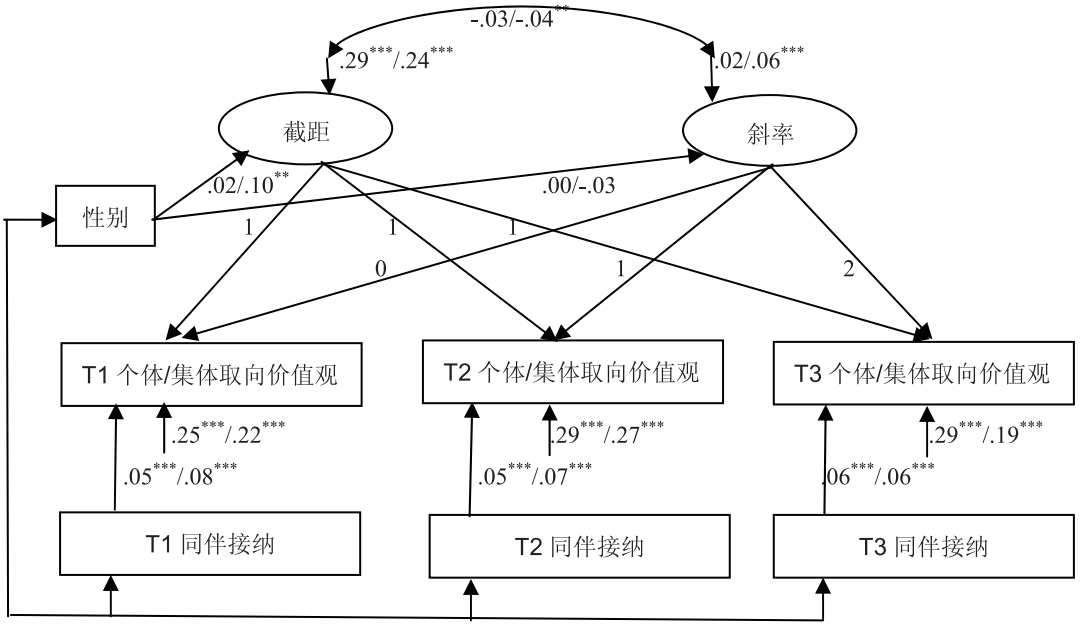


图 3 同伴接纳对个体 / 集体取向价值观变化轨迹的影响

从本研究文化价值观的线性潜增长模型参数来看，斜率为显著正值，表明在三次测试期间，青少年早期的个体和集体取向价值观水平呈线性上升趋势。个体取向价值观呈上升趋势的这一发现支持了Greenfield（2009）的社会变迁和人类发展理论：城市化、现代化和西方化可能会导致发展路径向个人取向转变。这一结果也从某种程度上支持了 Zeng 和 Greenfield（2015）的研究，他们发现中国人在 1970-2008 年间使用个体主义汉语词汇频率总体呈上升趋势，即个体主义价值观在不断增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日益以市场为导向和现代化，个体取向价值观已经以越来越快的速度登上舞台，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尤其是年轻一代（Chen & Chen, 2010; Kulich & Zhang, 2010; Zeng & Greenfield, 2015）。在社会转型背景下，儿童青少年学会自信、自立和自主等已经变得非常重要（Chen & Chen, 2010）。为了促使儿童青少年更好地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学校、家庭等鼓励学生参加多种探索实践活动（Chen & Chen, 2010），以培养他们的个人技能，如自我表现，自我指导和自信 (於荣 , 2002)。于此同时，儿童青少年越来越欣赏和认同有助于在社会中取得成功的个体取向价值观，如独立性、主动性，积极探索和自我表达 (Chen et al., 2012)。

集体取向价值观呈逐年上升趋势，这说明随着社会转型，虽然青少年早期的个性、独立性和自主性日益上升，但它未必会减少他们对社会关系和归属感的需要（Kagitcibasi & Ataca, 2005）。个体取向价值观的增强可能使青少年早期个体有机会探索个人独特品质，增强他们的主观能动性，从而推动他们实现个人目标。而集体取向价值观则可以帮助青少年更好地建立和维持社会关系，维护人际和谐，满足群体归属感（Kagitcibasi, 2012; Zeng & Greenfield, 2015）。这一结果支持了 Chen（2015）的多元建构观点。在当前新时代背景下，青少年早期个体既继承了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也吸收整合了个体取向的价值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价值观的有效整合（Chen，2015；Zeng & Greenfield, 2015）。

从本研究结果来看，女生集体取向价值观的起始水平显著高于男生，这与研究假设相一致。很可能是由于性别刻板印象作用，在社会化过程中女生比男生变得更加相互依赖，更多参与社会活动（Maccoby, 1998）。而集体和个体取向价值观的发展速度不存在显著性别差异。这些可能是因为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教育改革的推进，性别平等意识增强（Manago, 2015），合作减少、竞争增加（García, Rivera, & Greenfield, 2015）等等，这些都可能会促使男生和女生在变得更加独立、自主、自信、个性和适应社会环境等方面的进程中不存在显著差异。

此外，本研究的结果表明，同伴接纳作为青少年早期心理健康发展的重要情境因素，对个体取向和集体取向价值观的发展均具有促进作用。同伴接纳对集体取向价值观的提升很有可能源于青少年早期集体归属感的获得。被同伴所接纳的早期青少年，往往更加认同同伴群体，愿意参与同伴群体的活动，并在此过程中维护群体的利益。而同伴接纳对个体取向价值观的提升则可能源于同伴接纳为早期青少年提供的安全感，这使得他们可以更好地自我探索，自信地表达和彰显自己的独特性。集体和个体取向价值观并非是相背离的两极，新时代的青少年很有可能能够有效地整合这些价值观念，在实现集体利益的同时达成个体的目标。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良好的同伴关系对青少年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在现实的教育实践中，如能积极了解青少年同伴交往的过程，有效引导青少年的同伴互动，充分发挥同伴的自主教育功能，并抑制不良同伴群体的影响效应，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青少年建立积极健康的价值观念，从而帮助其更好地发展。

本研究通过追踪调查对青少年早期文化价值观的发展趋势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初步探讨，研究结果对青少年早期心理健康和价值观的养成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但也存在几点不足：一是追踪时间不长，次数较少。未来研究可延长追踪时间，增加追踪次数，以充分考察青少年早期文化价值观的发展变化过程。二是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父母受教育程度及教养方式等可能也会对价值观的发展产生影响，未来研究可以考察这些因素的作用，以更全面的了解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机制。

5 结论

（1）青少年早期个体取向价值观呈线性上升趋势，起始水平存在显著个体差异，而变化速度不存在显著个体差异；集体取向价值观呈线性上升趋势，起始水平及变化速度都存在显著个体差异。

（2）个体取向价值观的起始水平和变化速度均

不存在显著性别差异；女生的集体取向价值观起始水平显著高于男生，而变化速度不存在显著性别差异。

（3）较高的同伴接纳对青少年早期个体当时的个体和集体取向价值观的上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刘俊升 , 周颖 , 李丹 . (2013). 童年中晚期孤独感的发展轨迹 : 一项潜变量增长模型分析 . *心理学报 , 45(2),* 179–192.

苏红 , 任孝鹏 . (2014). 个体主义的地区差异和代际变迁 . *心理科学进展 , 22(6),* 1006–1015.

习近平 . (2014). 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 . *中国高等教育，10*, 4–7.

杨宜音 . (1998). 社会心理领域的价值观研究述要 . *中国社会科学，2,* 82–93.

於荣 . (2002). 略论我国基础教育的改革 . *教育探索 , 3,* 56–57.

Bakker, M. P., Ormel, J., Verhulst, F. C., & Oldhinkel, A. J. (2010). Peer stressors and gender differences in adolescents' mental health: The trail study. *Journal of Adolescent Health, 46*, 444–450.

Chen, X. (2012). Culture, peer interaction, and socioemotional development. *Child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 6,* 27–34.

Chen, X. (2015). Exploring the implications of social change for human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 issues and future direc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50,* 56–59.

Chen, X., & Chen, H. (2010). Children's social functioning and adjustment in the changing Chinese society. In R. K. Silbereisen & X. Chen (Eds.), *Social change and human development: Concepts and results* (pp. 209–226). London, UK: Sage.

Chen, X., Cen, G., Li, D., & He, Y. (2005). Social functioning and adjustment in Chinese children: The imprint of historical time. *Child Development, 76(1),* 182–195.

Chen, X., & French, D. C. (2008). Children's social competence in cultural context.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59,* 591–616.

Chen, X., Wang, L., & Liu, J. (2012). Adolescent cultural values and adjustment in the changing Chinese society. In G. Trommsdorff & X. Chen (Eds.), *Values, religion, and culture in adolescent development* (pp. 235–25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urran, P. J., West, S. G., & Finch, J. F. (1996). The robustness of test statistics to nonnormality and specification error in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Psychological Methods, 1(1),* 16–29.

García, C., Rivera, N., & Greenfield, P. M. (2015). The decline of cooperation, the rise of competition: Developmental effects of long–term social change in Mexico.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50(1),* 6–11.

Greenfield, P. M. (2009). Linking social change and developmental change: Shifting pathways of human development.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45(2),* 401–418.

Greenfield, P. M. (2013). The changing psychology of culture from 1800 through 2000. *Psychological Science, 24(9),* 1722–1731.

Hinde, R. A. (1987). *Individuals, relationships and cultur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ymel, S., Tarulli, D., Thomson, L. H., & Terrell–Deutsch, B. (1999). Loneliness through the eyes of children. In K. J. Rotenberg & S. Hymel (Eds.), *Loneliness in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 (pp. 80–108),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agitcibasi, C. (2012). Sociocultural change and integrative syntheses in human development: Autonomous–related self and social–cognitive competence. *Child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 6,* 5–11.

Kagitçibasi, C. (2012). Sociocultural change and integrative syntheses in human development: Autonomous–related self and social–cognitive competence. *Child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 6*, 5–11.

Kagitcibasi, C., & Ataca, B. (2005). Value of children and family change: A three–decade portrait from Turkey. *Applied Psychology: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54*, 317–337.

King, A. Y. C., & Bond, M. H. (1985). The Confucian paradigm of man: A sociological view. In W. S. Tseng & D. Y. H. Wu (Eds.), *Chinese culture and mental health* (pp. 29–45). San Diego, CA: Academic Press.

Kulich, S. J., & Zhang, R. (2010). The multiple frames of "Chinese" values: From tradition to modernity and beyond. In M. H. Bond (Ed.), *Handbook of Chinese psychology* (pp. 241–278).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iu, X., Fu, R., Li, D., Liu, J., & Chen, X. (2018). Self– and group–orientations and adjustment in urban and rural Chinese children.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49*, 1440–1456.

Luo, G. (1996). *Chinese traditional social and moral ideas and rules.*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People Press.

Ma, C. Q., & Huebner, E. S. (2008). Attachment relationships and adolescents' life satisfaction: Some relationships matter more to girls than boys. *Psychology in the Schools, 45*, 177–190.

Maccoby, E. E. (1998). *The two sexes: Growing up apart, coming togethe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Manago, A. M. (2015). Values for gender roles and relations among high school and non–high school adolescents in a Maya community in Chiapas, Mexico.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50(1),* 20–28.

Oyserman, D. (2017). Culture three ways: Culture and subcultures within countrie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68,* 435–463.

Oyserman, D., Coon, H. M., & Kemmelmeier, M. (2002). Rethinking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Evaluation of theoretical assumptions and meta–analyse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8,* 3–72.

Rubin, K. H., Bukowski, W., & Parker, J. (2006). Peer interactions, relationships, and groups. In N. Eisenberg (Ed), *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 Social, emotional, and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6th ed., pp. 571–645) New York: Wiley.

Way, N., Okazaki, S., Zhao, J., Kim, J. J., Chen, X., Yoshikawa, H., et al. (2013). Social and emotional parenting: Mothering in a changing Chinese society. *Asian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4(1),* 61–70.

Zeng, R., & Greenfield, P. M. (2015). Cultural evolution over the last 40 years in China: Using the Google Ngram Viewer to study implications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change for cultural valu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50(1),* 47–55.

Developmental Trajectories of Early Adolescents' Cultural Values in the New Era: The Effect of Peer Acceptance

Chen Wanfen[1], *Liu Junsheng*[1], *Li Dan*[2], *Chen Xinyin*[3]

([1] School of Psychology and Cognitive Scienc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2]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3]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A, 191104-6216)

Abstract Self- and group-orientation values represent two major different ways in which individuals view, and interact with, the world in relation to one's self. Whereas self-orientation, as indicated mainly by personal individuality and independence, is concerned with expressing one's distinct and autonomous views and behavioral styles in interactions, group-orientation, characterized by attention to group wellbeing and mutual obligation with others, taps into a sense of social affiliation, belonging, and fitting in the social context. In most societies,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values is considered a major task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Most previous studies have focused on the regional difference, cross-generational change and the national level's overall change during social change. However, much less is known about the developmental trajectories of cultural values of early adolescents in the changing Chinese society.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ocial change and human development, in the Chinese social transition, early adolescents' cultural values become more self- orientated in the peer interaction. From a "pluralist-constructive" perspective, self- and group-orientation values become more coexisted and integrated. However, to our knowledge, there is no specific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early adolescents' cultural values. Accordingly, a longitudinal study was conducted to examine the developmental trajectories of cultural values across early adolescent.

A total of 1244 early adolescents were recruited from nine primary schools and participated in this study. They were followed up for three years from grade four to grade six. Assessments of cultural values and peer acceptance were obtained from both self-report and peer nomination at three time points. Liner latent growth model was used to examine: (1) Initial levels and changes in cultural values over time; and (2) The prediction of both initial levels and changes in cultural values from gender and peer acceptance.

Among the results, early adolescents' self- and group-orientation values increased in linear trajectories from grade four (Mean age = 10.36 years, *SD* = 6.53 months) to grade six. Moreover, although girls had higher initial level of group-orientation values than boys, there was no gender difference in the initial level of self-orientation values and in the changes of self- and group-orientation values over time. Lastly, results from liner latent growth model showed that peer acceptance as a time-variant variable at given testing point could positively predict early adolescents' self- and group-orientation values at that time.

Our findings indicate that developmental trajectories of self- and group-orientation values are influenced by peer acceptance at different developmental stages.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change in cultural values across the critical age period of early adolescence can help early adolescents shape good cultural values.

Key words self-orientation value, group-orientation value, developmental trajectories, liner latent growth model, gender difference, peer acceptance